

战后中日关系：

『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



刘建平/著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Abnormal Historical Process and Construction

由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把中国排除在战败国对日交涉之外，中日“战争状态”持续20余年，到1972年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且仍然不中不西的是，具有了邦交形式的中日关系还是受到“历史问题”的控制而呈现国家外交对抗和民众情绪对立的僵局。政治“议和”之后历史“和解”的“烂尾化”综合症，考验着政治家的外交能力，也把“不正常”中日关系对象化的知识阐释和思想把握，则是学术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近世中国 ·

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 历史的过程与结构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World War II :
Abnormal Historical Process and Construction

刘建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刘建平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

(近世中国)

ISBN 978 - 7 - 5097 - 1570 - 3

I. ①战… II. ①刘… III. ①中日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IV. 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755 号

· 近世中国 ·

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

著 者 / 刘建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赵 薇

责任校对 / 谢 敏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字 数 / 316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570 - 3

定 价 /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传媒大学“211 工程”
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导言：历史再探讨的意义和理论新思维的可能性·····	001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的·····	001
（一）中日关系论的意义危机·····	001
（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007
（三）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对学术发展的意义·····	015
二 学术史与研究概观·····	017
（一）中国方面的研究概述·····	017
（二）日本方面的研究概述·····	019
（三）先行研究的比较特征·····	021
三 研究方法与结构内容·····	023
（一）研究方法·····	023
（二）资料·····	024
（三）本研究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025
 第二章 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原型·····	028
一 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	029
（一）野坂参三与中共日本研究的开端·····	029
（二）野坂参三对中共日本认识的影响·····	035

(三) 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及其历史局限性	049
二 新中国的“一边倒”国际战略与对日外交的始动	054
(一)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原则	054
(二) 新中国对日外交的起步	060
(三) 亚洲冷战体制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目标、模式	070
 第三章 冷战国际政治体制下“人民外交”的展开及其挫折	082
一 人民友好意义的“人民外交”	084
(一) 协助日侨回国	084
(二) “人民间”贸易协议	096
二 以民促官意义的“人民外交”与冷战体制的结构性障碍	102
(一) 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提出	102
(二) 以民促官遭遇困难：美国因素和台湾问题	117
 第四章 政治经济“分离”与“不可分”的原则较量	140
一 日本的敌视、蔑视立场与中国对日外交的政治整顿	142
(一) 引爆中日关系的导火索：从“刘连仁事件”到 “长崎国旗事件”	142
(二) 厘定原则：中国对日政策调整的过程与逻辑	155
二 政治经济分离：国民外交攻势下人民外交的民间化转型	169
(一) 贸易三原则——国民外交取代人民外交	169
(二) 民间贸易体制的确立——政治经济分离	177
三 政治经济不可分：军国主义复活危机中人民外交的复权	190
(一) 军国主义复活：冷战转型期的东亚政治和历史心理	190
(二) 象征对抗：民间贸易的再“人民外交”化	199

第五章 邦交正常化：“法律解决”与“政治解决”的攻防	205
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把握	207
（一）作为“战后处理”程序象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	207
（二）作为“唯一合法”主权确认的“恢复中日邦交”	213
二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分析	219
（一）“政治解决”的思路与试探	220
（二）“法律解决”的战术与效果	231
 第六章 结论：中日关系的历史连续性结构和周期性恶化的原理	248
 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284

第一章

导言：历史再探讨的意义和 理论新思维的可能性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的

（一）中日关系论的意义危机

2008年8月，由日本读卖新闻社和中国新华通讯社《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实施的“日中共同舆论调查”发布了惊人的数据：认为中日关系“好”的比例，中国为67%，日本为36%；关于“是否可以信赖对方”，日本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为19%，负面评价为78%，中国对日本的正面评价为56%，负面评价为42%；对今后中日关系乐观的，中国为75%，日本为38%。作为数据实证，日本媒体称之为“严厉日本与乐观中国”的构图，而权威学者的评论更显出居高临下、凌厉剖析的气势：中国政府“已经把对日政策转变到协调路线”，媒体也在“善意地报道日本”，但中国的“反日”是否发生了“本质”转变则还需要观察。^①很显然，这种分析的前提就是，中国以前对日本的批评、抗议和抵制均系有组织“反日”，现在则有所改悔了。必须指出，“反日”概念本身就是历史阴魂不散的蔑视性中国观和亚洲观，在日本侵略战争年代指亚洲国家人民的抵抗言行，战后则用于对亚洲国家人民批评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不肯谢罪和赔偿表示不满，是把这种批评故意上升为“民族”矛盾的传播策略。因此，在日本的这种历史观、国际政治理解和中国认识论逻辑上，中日关系经过小泉纯一

^① 「共同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08年8月4日。

郎首相造成的“靖国冰川期”之后，中国舆论又发生“友好”主旋律的奏鸣，当然是日本主体性的胜利。

对于中国，这一调查结果可谓历史转折性的冲击。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战后一直高举着中日友好的旗帜，并且“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从可测量的社会学统计来看，“人民”之所指是谁？“友好”的逻辑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的主流中日关系话语以“友好”立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1980年代发生了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事件”和祭拜战犯的“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友好”中日关系论开始受到所谓“历史问题”的冲击；但这种事态当时在中、韩等亚洲国家的严正交涉下最终还能以日本的让步而平息，所以总还有看起来是正义胜利、良知神明的结局。然而，这种正义历史剧到1990年代就出现了情节“烂尾”、不了了之的泥沼化趋势：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不断推动“历史问题”变本加厉地重演，并且在中国民众的日本观因此恶化的同时，由于不满中国追究“历史问题”以及“中国威胁论”、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日本舆论对中国的观感也严重恶化而与中国呈“民意对决”的态势。双方这种负面“国民感情”的郁积，在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民众抗议达到高潮的2005年出现“峰值”。^①但无论如何，中日关系的“靖国冰川期”对抗固然是一种不良状态，至少能算作即使从作用与反作用原理解释也还存在着历史不幸者立场的平衡局面；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平衡局面因中国的中日关系论“突然变异”而崩溃。受到日本批判“自虐史观”、鼓吹“重新认识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影响，尤其在21世纪初小泉发起靖国神社参拜冲锋的攻势下，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主张自动“撇开”“历史问题”以求“战略利益”、主张“中日接近”以集中应对美国“威胁”甚至“以日为师”而求友好合作的“超越历史论”、“对日新思维论”和“学习日本论”。而再经日本首相的更迭，日中首脑得以展开“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2008年5月的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联合声明更在中国制造了似乎冬尽春来的“友好合作”气氛。于是上述对日关系“三论”更大张旗鼓，造成了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之所谓“对日协调”和“善意报道”的风潮。中国的对日舆论大幅度改善了，然而滑稽的是，日本舆论依然对中国保持着冷峻甚至“嫌

① 刘志明：《中日相互舆论的变迁》，《中日传播研究》，学林出版社，2008，第5、15页。

恶”的视角。更为离奇者，日本政府方面也不厚待“新思维”主动“超越历史”的善意，反而在“历史问题”领域发动新的攻势，如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指责纪念馆的展示会造成“对日本人的反感和仇恨”，要求中国方面重新考虑布展。^①而即使是小泉政府之后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相关外交斗争，也仍然底流汹涌、暗藏玄机：现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早在2004年就已经向小泉提出了“以战后60周年为契机利用‘靖国神社牌’推进中日关系”的“前瞻性打牌法”，他认为安倍首相以“去不去参拜就是不说”的手段实现中日首脑会谈是“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性责任”，由此而至于福田内阁，终于达成了“惊人的”、“超过任何人预想”的东海共同开发共识。^②很明显，“前瞻性”的“靖国神社牌”打法不仅撬得了“友好合作”利益，而且这张牌从中曾根康弘首相时代的防守突破到小泉纯一郎首相时代的强攻不止，再到安倍晋三首相时代的以退为进、引而不发的模糊战术，已经摸索到成熟的打法了。安倍在退任后说明：绝不允许外国对首相参拜供奉在日本神社的“英灵”指手画脚、干涉内政，但政治需要根据现实考虑战略而不搞无用的“刺激”，“不明言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之要义就在于“决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能性和权利”。^③由此可见，所谓“历史问题”实乃日本有意为之并有战略、战术考虑的冲突形式，因此是中国躲不开、“撇”不掉的持久战。但以“超越历史论”、“对日新思维论”和“学习日本论”为代表的“新思维”中日关系论没有基于实证研究问题的觉悟，它在“友好合作”愿望上与传统的“友好”中日关系论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不敢正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不能摆脱日本文化外交的迷惑，而自动革除“友好”中日关系论的“历史认识正确”律他原则，改作“超越历史”的自律原则了。这种“突然变异”当然能对改善中国舆论的日本观有所贡献；可始料不及的是，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持续对立态度和调查显示的日本舆情冷漠，使得中国的片面改善变得滑稽和失态。这证明，丧失战争受害国家原则立场的“新思维”中日关系论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和逻辑可能的虚构，坚持它必然滑进从无利益到无尊严的陷阱。总之，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历史问题”的紧张斗争和“超越历史论”擢发

① 「バランス欠く展示物」、『読売新聞』2008年1月25日。

② 五百旗頭真「アメリカとアジア 共鳴するふたつのアリーナと日本外交」、『外交フォーラム』2008年12月号、8～12頁。

③ 安倍晋三「総理辞任の真相」、『文芸春秋』2008年2月号、123頁。

自拔式虚构性的显现，中日关系之“人民”对象和“友好”事实的可靠性如何？这一考验战后历史叙事主题的疑问严肃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其实，如果认真了解日本的学术、思想动向就会发现，日本学者、政治家早就公开表示对“友好”中日关系论的不满。1994年，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横山宏章在其著作《日中的壁障：战争与友好的代价》中批评了“无原则友好”的“畸形”的“日中友好外交”，说：由于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与中国的关系突然间被叫做友好，“一衣带水”的套话乱飞；然而，就实际的日中关系而言，“一衣带水”之说毫无意义，难以亲近的“壁障”横亘其间。所谓“亲密”者，“资本关系”也；对于乐此不疲的跨国资本来说，日本海、黄海真是像小河一般。但无论怎么强调“一衣带水”，“日本既不是中华世界的一员，也不是互知性情的伙伴。因此，由侵略和抵抗产生的战争责任乃沉重的课题，同时也并非一味地坚持友好就可以圆满解决。”他指出：“如果没进行正式的谢罪就修复关系，侵略者方面的负罪意识不能消去，作为亏欠便一直存在；而受害者方面就产生了利用这种亏欠达成自己目的的意识。现在的日中关系看起来像友好，其实背后就是这种畸形的关系。”所以，只有打破这种“壁障”，解消在战争责任方面的亏欠，才能相互以自由的立场构建“不即不离的普通关系”，这才是“健全的日中关系”。他呼吁：“如果日本要追求有见识的自主外交，首先应该重新检讨对中国的外交。”^①

作为学者，横山有着揭露事实的勇气和思考问题的逻辑，即严肃正视未经谢罪、赔偿等战争责任处理过程之“友好”的虚构性或空想性。但外交官和政治家对“友好”的批评就往往着眼于现实政治而不触及战争责任或历史问题，即主要考虑日本的“自主外交”了。2000年的冬天，即将卸任的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在展望新世纪的日中关系时说：“日中两国应该向普通的国家交往过渡，只有不再需要使用‘友好’这种外交辞令时，才说明日中关系成熟了；但目前还必须用‘友好’来维系双边关系。”^② 自民党的重要领袖安倍晋三在2005年9月谈到中日关系时更不无嘲讽地说：“日

① 横山宏章『日中の障壁 戦争と友好の代償』サイマル出版会、1994年、まえがきと9、24頁。

② 香港《亚洲周刊》2001年2月5日~2月11日刊，第35页。对这一报道，笔者于2005年5月21日在日本东京请谷野先生作了确认。他还说：“我们与美国、印尼等的关系都不说什么‘友好’之类的话。但鉴于现在日中关系的严峻状况，有志者继续谈‘日中友好’还是必要的。”

中关系有一个日中友好的概念。可是，看看所谓日中友好的状况是由谁来判断的？经常是中国在判断，说什么‘这违反了日中友好’、‘日中友好崩溃了’之类。从来没有听说过日本提出这种问题。这显然是不正常的。”^① 可见，日本的精英阶层认为中日关系之所谓“友好”既不诚实也不真实，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愿意忍受其虚构性而开始否定它了；到安倍晋三担任首相，他提出了“战略互惠”的新概念来取代中日关系的“友好”定义。尤其可怕的是，在主流政治家那里，这种否定是以完全指责中国的无自我反省方式展开的。

而传统的“友好”中日关系论和时髦的“新思维”中日关系论都不能为应对这种批评提供知识和思想，因为更严峻的事实是，日本的中国外交和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已经建构起了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论”和“国家利益论”话语，这足以压倒中国条理不清的“友好”叙事并置“新思维论”的“战略”大话于自证自欺的逻辑陷阱。主张中国对日外交“战略论”的日本学者认定：中国曾经通过增强与“‘日本人民’的友好”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通过日中关系正常化离间日美、日台”关系；^② 中国推进民间交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就是企图以日本为突破口，“打破旧金山体制和美国封锁中国的政策”。^③ 也就是说，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所谓“人民外交”和“中日友好”，不过是中国为实现自身利益和国际政治目标的战略策略而已；这暗示了中国并无道德诚恳之美，反有干涉内政之嫌。这或许是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但以中国的战后中日关系史叙事之粗疏并不能对此有所辩白，比如虽然反复强调“中日友好”乃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但“以民促官”和“孤立美国”之类的说法不也在事实上支持了日本学者所突出的中国对日政策“战略论”和“国家利益论”吗？而当今的“新思维”中日关系论虽然逻辑混乱，但它既然表示“中日接近”的目的在于“集中应对美国”和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不就证明他们毕竟还是努力谋划或向往着“战略”和“国家利益”吗？所以，日本学者进而肯定中国是“以战略和利益外交为得意拿手”，甚至认为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也有借此“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使日本干脆地断绝与台湾的国家关

① 安倍晋三「大きな改革のためには党内多数派形成も必要だ」、『中央公論』2005年9月号、106頁。

② 岡部達味『中国の対日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44頁。

③ 王偉彬『中国と日本の外交政策』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226頁。

系的战略判断”。^① 而舆论界则更不加掩饰地以“战略论”指责中国，称日本国内存在的“亲中感情”开辟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道路，“那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对日战略产生的最大成果”，但“战略优先”的中国打开与日美的关系是为了对付苏联，“表面上合唱友好，实际上并没有解除对日本的警戒”。从这种“战略论”推演，他们认为现在的“反日”也是中国“预谋的战略”。^② 总之，中国的中日关系论已经面临着政治嘲弄和学术批评而无能自辩，被定义为“中日友好”的中日关系结构和“友好”中日关系叙事在日本的主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中已经遭到消解和否认。

“中日友好”在中国也遇到了挑战。一个时期以来，日本主要政治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和日本舆论所给予的支持，通过电视、网络等开放和多元的媒体直接、可视化地否定了中日友好。在社会生活已经信息化了的中国大城市，传统的主流媒体培植的“友好”话语更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再经过2005年春天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抵制日本试图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规模街头行动，^③ 友好舆论的大局在大众层面发生严重分裂而不复存在，甚至出现了类似于韩国的“重新谈判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或更加激烈的主张，“新思维”中日关系论则一直受到学者批评和网络舆论的非难。总之，中国的中日关系论，无论是战争责任“无原则”但“历史认识”有原则的传统型“友好”话语，还是连“历史认识”问题也回避因此可称之为“绝无原则、绝对友好”的“新思维”话语，在中日两国都丧失了事实根据和逻辑可能，遭遇了意义的危机。

中国的中日关系论的意义危机在于它不能为人们理解中日关系提供有根据的知识和有逻辑的思想，所以它的意义危机实际上是它的知识危机。人们越来越关心战争受害赔偿问题和民间运动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战后中日关系事实真相的发掘和意义重建；这些努力正在推动着人们为“友好”中日关系论的现实危机寻求历史的和政治的答案。为了建构能够合理阐释当今日中日关系事态和有根据地思考中日关系未来的思想理论框架，为了建设有可靠实证

①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はじめにと35頁。

② 清水美和『中国はなぜ「反日」になったか』文芸春秋、平成17年、79と102頁。

③ 对于2005年春中国几个大城市发生的抗议运动，日本媒体指称为“反日游行”，中国官方媒体则称为“涉日游行”；但由于中国命名的所指暧昧和媒体对事实报道、讨论的回避造成了传播障碍，日本的这种暗含有指责中国民众褊狭无理的指称已经在媒体、舆论呈固化趋势。

研究的中日关系史知识系统，我们不得不直面“友好”话语失效的危机而以新的问题意识展开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再研究，以澄清传统历史叙事中的“中日友好”话语内涵着怎样的国家间关系结构，在知识的意义上把握这种结构生成的历史过程，进而思考其问题所在。并且我们知道，中日友好的基础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新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人民外交”政策建立起来的；因此，为了梳理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逻辑和把握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有必要在历史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对“人民外交”概念作出有逻辑性的理论思考，探讨它与邦交正常化等国家间政治行为的关系。另一方面，近几年来，由于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特别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困扰使得官方往来遇到障碍，以“人民外交”为知识思想背景的民间外交、民间交流理念又有所流行。^①那么，如何认识这种联想式、印象式的外交政策灵感？对战后中日关系史的严格实证研究将会提供有益的知识参照和经验理论。这也是战后中日关系再研究的一个意义所在。

（二）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当我们直面中日关系话语的意义危机而试图从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研究中寻求知识和逻辑的时候，就会注意到：尽管新中国积极致力于中日友好并为此协助日侨回国，宽大处理日本战犯，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尽管日本也存在着包括对此感恩戴德在内的种种推进中日交流的友好力量，但战后中日关

① 早在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开始参拜靖国神社“冲锋”而陷中日关系于困境之后不久，《中日关系史研究》2002年第3期就发表了吴学文的文章《民间外交功德无量》，通过回顾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民间外交”，肯定“民间外交仍旧是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健康发展的基石和保障”。2005年6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发表专栏评论《从民间友好做起》，称中日关系有着以“民间外交”推动“以民促官”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优良的传统”，坚信由小泉“倒行逆施”造成的中日关系困局“最终还要靠两国人民”来“以民促官”、“以经促政”达成“突破”并“形成世代友好的形势”，主张中国“主动推动”和日本“积极配合”。2006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国际副刊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金赢的文章《渡边恒雄转变的积极意义》，称赞日本读卖新闻总裁渡边恒雄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批评，认为这和历史上日本“民间”有识之士推动政府外交相类似。终于，中国方面于2006年3月特邀日中友好七团体访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胡锦涛强调，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局面，责任不在中国方面，也不在日本人民。他相信七团体的来访“将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2007年4月，当中国总理温家宝开始赴日本展开“融冰之旅”之际，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在中央电视台接受关于“中日民间外交”的访谈时说：接待七团体访华就是“通过民间外交的沟通，搭建一个平台”。那时候官方领导人之间没有直接接触，“与民间人士的接触是很重要的”。

系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特征是“周期性恶化”，无论在“人民外交”时期抑或在邦交正常化以后都是如此——1950年代末的“长崎国旗事件”，60年代末的“军国主义复活”动向，80年代的教科书事件和参拜靖国神社风波，90年代围绕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对峙，直至新世纪初恶化到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的“小泉靖国冰川期”。这表明，战后中日关系有着导致“周期性恶化”的特殊结构。

然而，至今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不仅没能有根据地阐释反复恶化的历史演变逻辑，甚至没有试图把握这种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视角作针对个人的批评，鲜有对国家间政治的结构分析。比如，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中日交流断绝的原因是由于岸信介首相的反共、反华政策；^①直到小泉纯一郎首相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研究者也还是倾向于比较简单易行的归咎于个人，即从小泉的历史观、个性甚至所谓“本能”等方面发掘原因。^②基于这种知识思想，中国的对日外交总是一方面发动思想批判，一方面期待“友好”政治家的出现来扭转乾坤，显然欠缺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的学术自觉。而在日本则大致活跃着两类解释：一种是结构主义的，即美国因素和台湾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中日关系；^③一种是“中国异质论”的，即认为50年代末的中日交流断绝是由于毛泽东“独断”导致的“强硬”对日路线和中国“急进”的国内政策，是由于中国的大国“面子”意识和“斗争外交”思想等，^④给中国贴上了政治“异质”必然损害中日关系的模式化标签。如此着力于把中国政治问题化或把国际政治环境问题化而自我反省不足的历史“知识”当然地影响了现实的政治外交分析，比如在小泉时代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外交斗争中，日本的主流学者们或把抗议参拜称作“反日运动”，认为那是中国的“独裁制度”、“党内斗争”或“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⑤或把中日关系僵局看作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 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44～163页。

②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第263页。

③ 岡部達味『日中関係の過去と将来』岩波書店、2006年、42頁。田中明彦『日中関係 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50～52頁。

④ 王偉彬『中国と日本の外交政策』ミネルヴァ書房、2004年、184と229頁。田中明彦『日中関係 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52頁。

⑤ 小島朋之「意思統一を図れぬ政権」、服部健治「一党独裁のリスクを認識を」、『産経新聞』2005年4月19日。中嶋嶺雄「対中外交は暫時凍結も」、『読売新聞』2005年4月19日。毛里和子「共通の地域史作りを」、『朝日新聞』2005年4月27日。

国际政治“结构变动”的表征，认为由于冷战后苏联这一共同敌人的消失、台湾问题刺激了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对立、中国的高速发展造成了日本的担心等，中日关系正孕育着新的结构，进入新的阶段。^①但这些似乎有理论、有深度的分析不能解释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民主的韩国对日本的抗议往往比中国来得更加强烈。而且，尽管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设有“反霸权条款”，但日本所要求的“不针对第三国”说明使得这一条款显得滑稽，也就是说日本原无意与中国共同对付苏联，何来冷战共同敌人苏联之说？总之，上述名目下的议论在知识思想意义上多属无效阐释。

概括起来，把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政治家的“反共”或中国政治的“异质”都是简单的意识形态论。而日本学者的“结构论”固然可以解释部分事实，但把岸信介侮辱中国的原因完全推给美国和台湾的压力，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完全推给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结构变动”，则根本经不起实证——因为岸信介首相在1958年面对中国劳工刘连仁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奴役的事实拒绝任何谢罪、赔偿，还亲口把中国国旗与“桌子、椅子”之类的“器物”相提并论；^②小泉纯一郎首相则反复表明其参拜靖国神社乃向日本（为侵略亚洲国家）战死的军人表示“敬意和感谢”。^③这种象征着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中国及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赤裸裸的蔑视、侮辱、恐吓的言行，和冷战结束与否显然无关。可见，由于实证的过程研究不足，中日关系的特殊结构没有被揭示出来。

而如果更深入地检点战后中日关系研究的状况，就会发现存在着许多尚待探讨的问题。从整体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来看，中国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时就有一种关于人民外交和中日友好历史叙事的框架确立起来，即“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官半民、恢复邦交”的总体性结论。在这种模式化叙事中，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一般的是被述及了，但历史发展的逻辑即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联并没有呈现出来。例如，论及人民外交和中日友好政策，一般著作都会提到“把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区别开来”的对日

① 国分良成：《“1972年体制”的变化与发展协调关系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第43～50页。毛里和子『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書店、2006年、130と205頁。

② 「通商代表部の国旗問題」（1958年4月9日・衆院外務委）、朝日新聞社編『資料 日本と中国』45～71頁 朝日新聞社、昭和47年、100～102頁。

③ 「首相官邸で記者団に」（2003年6月19日）、渡辺恒雄・若宮啓文『「靖国」と小泉首相』朝日新聞社、2006年、102頁。

政策原则,^①但对于新中国确立这种政策原则的根据何在,则往往没有分析和交代。其实,人民外交和中日友好政策与中日两国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以及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着,但相关研究存在许多空白。^②再比如,关于50年代末的“长崎国旗事件”和由此导致的中日关系断绝,一般认为是由于岸信介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破坏中日友好而中国政府给予了断然的回击和斗争。^③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重大疑问就是:既然人民外交政策的原则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区别开来”,为什么在“长崎国旗事件”之后把民间交流也切断了?实际上,这与人民外交政策遇到冷战国际政治体制的结构性障碍以及中国国内政治困难有关;倘若不以过程研究做出比较细致的实证分析,便难以厘清中日关系突然断绝的原因。^④再就是对重大事实的遗漏,例如关于人民外交之“以民促官”的历史作用,一般著作都给予充分肯定。但事实上,历史本身比这种结论复杂丰富得多。作为毛泽东、周恩来国际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人民外交思想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不过还必须认识到,毛泽东、周恩来不是哲人式的思想家,而是有理论志趣的政治家,所以即使是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注经释义式并有政治实用主义之嫌的中国传统学术手段,而应当使对中国外交的实态探究与领导者的思想相互关照,在细致的过程研究中建构反思型的实证学术——一种探历史学之真、求哲学之善的社会科学工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和学术方向感,我们就会特别注意新的史料并仔细阅读。比如,即使没有查阅1959年3月间日本《朝日新闻》对周恩来会见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谈话情况的报道,也不能调阅中国的有关档案记录,但可以发现,日本学者古川万太郎1981年7月出版的《日中战后关系史》对上述材料已有较为详细的引用,中国在1990年12月出版的西园寺公一回忆录《红色贵族春秋》也有引用,即周恩来在人民

① 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39页;罗平汉:《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年中国对日政策研究》,时事出版社,2000,第15页。

② 刘建平:《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第88页;《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第163页。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第156页;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第110页。

④ 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第91页。